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文库

ZHUANXINGQI ZHONGGUO DE GONGZHONG CANYU HE
SHEHUI ZIBEN GOUJIAN

ZHUANXINGQI ZHONGGUO DE GONGZHONG CANYU HE SHEHUI ZIBEN GOUJIAN

转型期中国的公众参与和 社会资本构建

陈福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文库

.....

ZHUANXINGQI ZHONGGUO DE GONGZHONG CANYU HE
SHEHUI ZIBEN GOUJIAN

ZHUANXINGQI ZHONGGUO ANYU HESHEHUI ZIANYU HESHEHUI ZIBEN GOUJIAN

转型期中国的公众参与和 社会资本构建

陈福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期中国的公众参与和社会资本构建 / 陈福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 - 7 - 5203 - 2804 - 3

I. ①转… II. ①陈… III. ①公民—参与管理—社会资本—
研究—中国 IV. ①F124.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677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沈丁晨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 75
插 页 2
字 数 258 千字
定 价 75.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文库

编 委 会

(由学院学术委员会成员组成)

主 编 陈振明

编 委 朱仁显 李明欢 陈炳辉 卓 越

胡 荣 黄新华

总 序

公共事务是一个涉及众多学科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领域，既是政治学与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是法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题中之意。公共事务研究是国家的一个重大战略要求领域。随着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以及数据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时代的来临，当代国内外公共事务的理论和实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急需公共事务及其管理的创新研究。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分别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依法治国的改革总目标。

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现代化，依法治国，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都迫切需要公共事务及其管理理论的指导及其知识的更广泛应用。这为中国公共事务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改革与发展中的大量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问题需要系统研究，国家治理的实践及其经验需要及时总结。新形势要求我们迅速改变公共事务及其管理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的局面，推动中国公共事务及其管理的理论创新，以适应迅速变化着的实践发展需要。这是我们继续出版《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文库》这套丛书的初衷。

厦门大学政治学、行政学和社会学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我校就设立了相关的系科，中间几经调整分合及停办。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作为国内首批恢复政治学与行政学学科的重点综合性大学之一，我校复办政治系，不久更名为“政治学与行政学系”，随后社会学系也复办了。2003 年，由我校的政治学与行政学系、社会学系和

人口研究所三个单位组建了公共事务学院,2012 年学校又批准成立了公共政策研究院。

经过 30 年的发展,我校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迈进了国内相关学科的前列。学院及研究院拥有公共管理、政治学 2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二级学科博士点(国家级重点学科),社会学二级博士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公共管理硕士(MPA)和社会工作 2 个专业学位,“行政管理”国家级特色专业,公共管理、政治学和社会学 3 个福建省重点学科,厦门大学“985 工程”及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公共管理重点学科建设平台,福建省 2011 协同创新中心——“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福建省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公共政策与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和福建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厦门大学公共服务质量研究中心”以及多个人才创新或教学团队。此外,学院还建立了设备先进的公共政策实验室。

本学院及研究院已形成一支包括多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或讲座教授及中组部“万人计划”人才在内的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专业结构比较合理、创新能力较强的人才团队,并形成了包括公共管理理论、公共政策分析、政府改革与治理、公共服务及其管理、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人才发展战略、社会管理及社会保障、国家学说、新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社会性别与公共事务在内的多个有特色和优势的研究领域或方向。

作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和公共政策研究院以及“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和 2011 省级协创中心等项目或平台的研究成果,《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文库》围绕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这一核心,遴选我院教师的各种项目研究的成果以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汇集出版,旨在显示近年来我院公共事务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进展,加强与国内外学界的交流,推进我国公共事务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创新与知识应用。

陈振明

于 2016 年 8 月 28 日

摘要

在当代中国社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单位制的解体，各类公众参与在社会中逐渐活跃。然而在实践中，也遇到不少的矛盾和困境。因此本书从普特南的公众参与和相关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在中国的转型背景下，对公众参与的现状和困境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和阐释。

本书首先回顾了学术界对市场经济和公众参与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存在“市场推进论”和“市场制约论”两种意见。市场推进论的主要观点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个人拥有更多的自主能力和资源，带来了公众参与的繁荣。而市场制约派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制约了人们的发展合作精神，从而影响了公众参与。本书的经验研究发现市场经济的两种效应都是存在的，一方面，它的确提高了个体的能力和资源在公众参与中的效用；另一方面，它也存在着对公众参与的抑制作用。对此，本书做了进一步的推论：如果市场经济的确降低了人们的合作意愿，人们不愿在参与中与他人建立新的社会合作和联系，那么由公众参与网络生成内部（网络成员间的信任和互惠）和外部社会资本（普遍信任）的能力，也应该是降低的。经验资料的结果也支持了本书的推论。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研究宏观社会组织制度模式对公众参与行为产生的影响呢？普特南强调了社会组织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然而公众参与研究中也存在着奥尔森关于社会利益组织将有害于社会发展的相反论断。但实际上二者的理论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团结型社会资本和桥接型社会资本，奥尔森则提出排他性团体（利益）和相容性团体（利益）的分析工具。本书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内

在联系，即排他性团体创造了团结型社会资本，相容性团体则生成了桥接型社会资本，换言之，相容性团体是普特南所强调的公众参与网络的组织形式，而团结型社会资本的狭隘性则正是奥尔森分析的利益团体分利化倾向的社会产品。不过奥尔森强调的各类利益团体和普特南分析的大众性社会组织所依赖的社会背景，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制度和管理规则完全不同。因此，本书首先从组织的整合效应、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和经济性、参与的非政治化以及参与的合法性问题四个方面阐释了这种差异。本书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社会，奥尔森组织也能实现从团结型社会资本到桥接型社会资本的跨越，从而促进社会的整合；但另一方面，普特南组织却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网络的封闭性。这种现象的内在原因是：在特定制度和管理方式的作用下，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公众参与网络也会成为小而分化的利益团体，进而无法承担起在更大社会范围内促进整合的责任。其次，本书使用各国公众参与的资料，从横向比较方式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相似制度结构的国家或地区中，两类团体的社会影响具有内在趋同性。因此，无论是奥尔森还是普特南的研究，其适用性都需要考虑国家或地区的组织制度和政治整合模式对公众参与或社会组织的形塑关系。

本书最后考察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公众参与和社会资本构建之间独特的关系路径。基于相关分析，中国信任的构建包含了一个基本命题：中国人的信任和关系具有同构性，因此，亲属信任对不同类别人群信任的影响就取决于关系的远近亲疏。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资本有很强的不依赖公众参与构建的内生属性。通过对该命题的推演，本书立足于以下两个假设展开分析：首先，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之间可能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当公众参与依赖着关系路线形成时，其所建立的信任仍然是一种无法普遍化的信任。其次，在市场化中存在着两种力量，其在推进普遍信任的同时，也增强了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背景下，依赖关系路线的公众参与和普遍信任之间的矛盾也被增强了。根据实证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个启示：第一，在当代中国社会，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之间的内在矛盾仍然存在，无论是对不同信任之间关系的分析，还是根据网络结构对信任程度的影响，都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市场经济发展降低了人际关系中生成的特殊信任,然而由于缺乏公共协商制度,不平等效应对封闭性的作用也增强了,因此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强了。第三,公众参与中信任的建立方式仍然遵循差序性人际关系路径,这意味着在中国社会的公众参与中,尚未形成基于制度和共识等规则力量建立社会资本的方式。

此外本书也尝试对互联网公众参与行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研究从数字不平等的视角出发,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差异与在线公众参与之间的内在联系,即试图分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由于各自偏好的网络使用类型,是否进一步强化了“参与鸿沟”。本书利用2011—2012年对10个城市在职网民的调查数据,结合对社会经济地位和使用心理以及行为变量的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互联网使用鸿沟显著存在,但是以娱乐互动为中介的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低教育人群的政治表达,而且独立于社会阶层影响的娱乐互动效能也能够促进互联网使用者进一步去获取政治信息的行为。同时研究也发现,高社会阶层在网络公众参与中信息和互动的双重优势,可能潜在地给予了他们在公共议题上的引导性权力。

最后,本书从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转型背景出发,对公众参与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对于公众参与困境的内在原因,本书的结论是:由于制度系统的特殊性和文化传统的滞后作用,使得中国的社会资本构建处在一个传统型社会资本尚未消失,而现代型社会资本尚未形成的过渡阶段。因此当重新思考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时,本书认为对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国家建设和制度建设在公众参与和社会资本构建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推动鼓励性的社会组织制度建设和发展跨人际的社会网络,会更利于公众参与发挥出构建社会资本的效果。在实践中,这也需要通过相关制度保障和公众素养教育来助其实现。

关键词: 公众参与 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 社会转型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主题与概念	(3)
第三节 公众参与和社会资本研究的意义	(7)
第二章 理论视角与综述	(13)
第一节 公众参与的社会资本视角	(13)
第二节 公众参与的理性视角	(21)
第三节 公众参与的制度与文化视角	(28)
第三章 研究架构与设计	(47)
第一节 研究架构:理解当代中国公众参与的三个出发点	(47)
第二节 研究思路:公众参与与社会资本构建的转型背景	(52)
第三节 数据资料与研究方法	(58)
第四章 强市场中的“弱参与”:市场转型中的公众参与	(64)
第一节 市场转型与公众参与	(65)
第二节 经验研究与发现	(70)
第三节 进一步的探讨:“原子化”的个人参与	(84)
第四节 本章结论与讨论:强市场中的“弱参与”	(93)

第五章 组织制度的塑造力量:两类组织与社会资本的创造	(97)
第一节 公众参与的两类组织结构	(98)
第二节 当代中国两类组织的特质	(103)
第三节 数据与测量	(114)
第四节 本章小结与讨论	(141)
第六章 当代中国公众参与和社会资本的文化特质——	
自己人与陌生人	(148)
第一节 内在命题:特殊信任的意义	(149)
第二节 两个假设:市场转型过程中不同信任之间的 内在矛盾	(155)
第三节 经验研究与发现	(162)
第四节 本章小结与讨论	(175)
第七章 跨越参与鸿沟:数字不平等下的在线公众参与	(178)
第一节 互联网时代的公众参与	(179)
第二节 实证与研究发现	(188)
第三节 本章小结与讨论	(201)
第八章 结论、贡献与局限	(204)
第一节 转型期中国公众参与的基本状况与解释	(204)
第二节 让参与运转起来:制度的意义	(214)
第三节 政策意义、研究局限和未来方向	(226)
参考文献	(232)
附录 互联网用户网络参与调查问卷	(243)
后记	(254)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距今已有 40 年，在这期间，中国发生了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快速发展和变化。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际技术和文化不断开放和引入的背景下，社会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过去，静态人口的社会和文化地平线是由单位、户籍制度、资源由国家分配等决定，现在，代之而起的是一个高度流动、消费主义主导以及对新机会的追逐所推动的社会。单一的计划经济力量在人民生活中已经逐渐消退，这为公众生活和人际交往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

在民间和学术领域，具有广泛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形态逐渐受到了学术界和媒体的重视。之所以有这一场理论界的大讨论，是因为在国际社会的历史经验中，公众参与的活跃是与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逐步确立以及现代性文化的发展和内化相联系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①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重大变革，同时这场变革对公众参与和社会治理的影响也慢慢地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世界。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 年 10 月，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uanti/19thcpc/baogao.htm>。

什么样的社会是一种公众广泛参与的状态呢?在这一概念的理解上,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基本有着共识,那就是一种多元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即理顺国家—市场—社会三方关系,推动共同参与和缔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进入新时代以来,这种社会治理格局进一步形成。在特定社会事务领域,政府逐渐转变为宏观指导、制度规制和监管的角色,而大量的社会性、服务性和居民自治性事务则由社会组织来承担。因此,各类社会组织在承担社会职能方面,将担负更加繁重的任务,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那么如何理解公众参与和社会组织所需承担的功能和社会职能呢?本书认为首先要理解中国从单位社会转型到市场社会的改革。单位制度曾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是国家分配社会资源和实现社会控制的方式,^①是控制和调节整个社会运转的中枢系统,^②是再分配体制下的制度化组织。城市中的事业和行政单位是最典型的“单位”,它在宗法制度和家族消解的情况下,承担了原有家族的功能,并随着供给制的推广和党组织向下的延伸而最终被确立,单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理想和制度惯例的结合,^③也是在资源再分配的需求下形成的一个中介组织形式。单位也因此具有功能全面、资源的非流动性、社会活动的行政特性、成员利益的非市场化及人际交往的私人化等特征。按照沃尔德对单位分析所用的“组织性依附”概念的理解,单位之所以具有以上特征和功能,是因为单位是建立在对稀缺资源再分配的基础之上的。按照沃尔德的看法,人们不能从单位外部获取资源而只能从单位中获取资源,被牢牢地束缚于单位,这影响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公共娱乐甚至私人生活空间,从而使人们对单位形成了深度的依赖性。在这种单位制背景下,人们的社会交往,无论是私域交往还是公域交往,很大程度上都局限于单位内部。

① 李路路:《中国非均衡的结构转型》,载袁方等《社会学家的眼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页。

② 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③ 同上。

但随着改革开放及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中国社会中那种由国家集中控制和统一分配资源的体制正在逐步改变。非公有制经济的崛起和公有制产权的明晰化及单位专业功能的逐渐加强,使原来由国家直接控制的社会资源面向社会分散和转移。市场机制的逐步渗透,严重冲击了旧的体制,单位依附于国家、个人依附于单位的传统生存格局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迁。人们对单位的依赖,事实上正在不断降低,从而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的单位制逐渐解体。

因此,本书所分析的公众参与或社会组织参与,首先是对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中资源逐渐流动、人们自主空间逐渐扩大、社会成员自主意识逐渐提高的一种组织化力量的承接,这种承接表现于社会成员之间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力量整合成为一个个新生的社会群体,并通过群体性的参与和交往,互相形塑着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元关系,从而再生产出新型的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结构。

第二节 研究主题与概念

一 研究主题

据统计,1965年,中国有全国性社会组织近100个,地方性社会组织6000多个。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各类社会组织陷入“瘫痪”状态。1976年以后社会组织开始发展并再度进入繁荣时期,截至2016年底,全国范围内的社会组织已达到70.2万个。但是社会组织的空间分布呈现出高度的不平衡,表现为其在城市中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经济发达地区远远高于经济落后地区,沿海地区远远高于内陆地区,总体而言,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发育程度,与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活跃程度密切相关。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另一个特点是政府对组织发展的推动。据世界银行2005年6月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有各类事业单位100多万个,纳

入政府事业单位编制的工作人员近 3000 万, 占公共部门就业人数的 40% 以上, 其中包括我国 60% 以上的受过最良好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① 我国事业单位各项事业经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 30% 以上。因此, 我国目前的社会组织、公募基金会多数由政府部门或相关机构出资, 工作人员或负责人纳入事业单位编制, 有的甚至纳入国家公务员系列。

另外, 据专家估计, 我国的社会组织实际数量远远多于登记数量。清华大学王名教授在《中国 NGO 发展和研究现状》的报告中认为: 在中国范围之内开展各种公益或者互益活动的社会组织大概是 300 万家, 但是这里边真正按照现行法规登记注册的只有十分之一。^② 国际上许多国家对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采取备案制管理, 并不需要按照法律严格注册登记。因此, 我国大量社会组织游离于法规登记之外其实具有一定的客观现实性, 如我国农民已自发成立近 13 万个协会, 但其中大部分没有到民政主管部门登记。^③ 对社会组织而言, 行为的合法性比组织的合法性更为重要。

在社会组织大量发展的同时, 公众参与本身也面临一系列问题, 例如部分公众在政治上较为冷漠, 没有参与的热情; 部分公众有很高的参与热情和参与需求, 却缺乏通畅合法的参与途径; 部分公众在参与中存在失序现象, 与政府发生冲突; 还有部分公众参与失去控制, 危害社会的正常秩序。^④ 与此同时, 社会对相关社会组织的认知和信任程度也较低, 相关调查显示, 90% 以上的人在面临问题时倾向于找政府解决, 只有 3% 的人遇到问题寻求社会组织的帮助, 一半以上的人对私人、社会属性的东西不信任, 社会组织参与的欠缺反过来影响了其自身的赋权能力。^⑤

① 世界银行:《中国:深化事业单位改革》, www.worldbank.org.cn/Chinese/content/pstu_cn.pdf。

② 王名、刘培峰等:《民间组织通论》, 时事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262 页。

③ 李勇:《民间组织的专项改革与制度创新》, 载王名主编《中国民间组织 30 年——走向市民社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22 页。

④ 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 30 年:1978—200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5 页。

⑤ 贾西津:《中国公民参与:案例与模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5 页。

因此,本书旨在立足于当代中国发展和转型的背景下,探讨公众参与的问题,并且希望回答以下几个基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当代中国现代社会主义道路,是以经济带动社会、政治的变化而展开的道路,在这一转型的基本思路中,公众参与是如何并且以怎样的方式展开的?

(二)公众参与中相关问题和困境存在的内在社会机制是什么?我们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框架对这种社会机制的逻辑加以阐释?

二 概念界定

在国际上,社会志愿性、制度化、多样性的公众参与已经成为社会参与的具体表现形态,公众参与这种社会实践形态,一直被视为社会发育成熟、公众表达自治精神的基本体现。^① 笔者认为在我们的研究中,需要对公众参与和社会资本这两个概念进行相应的界定,并厘清其内在的联系和区别,从而指导本书后续研究的开展。

(一) 公众参与

根据公众参与协会(IAP2)的标准定义,公众参与的定义包括:(1)公民在影响其生活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主要是行政决策)有发言权;(2)公民对政策制定能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3)参与过程中所有参与者的利益能够得到充分沟通,而且该过程能够满足参与的需要;(4)参与过程具有开放性,便于潜在的受影响群体的参与;(5)参与过程能够清晰定义公众参与的机制和方式。

在本书的分析和阐释目标中,不同于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强调政策决策领域的参与,主要将公众参与定位为一种社会学所重视的社会性参与,偏重于社会组织的参与,包括社会成员参与各类的体育或娱乐组织、俱乐部、社会联谊组织、艺术音乐或教育组织、环境组织、专业协会

^① 刘岩、刘威:《从“公民参与”到“群众参与”——转型期城市社区参与的范式转换与实践逻辑》,《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学会)、慈善公益组织、社会福利组织等。

(二) 社会资本

在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基本存在两种取向。一种取向关注个体行动者如何利用自身社会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来实现个人目标,例如地位获得。^①另一种取向则立足于集体行动者,也就是参与行为如何提高组织的集体目标,例如参与性民主或社会发展。^②

本书的研究,则主要立足于组织或社团层面上的社会资本创造。在普特南的研究中,公众参与网络被认为是推动公民之间合作的关键机制,并且提供了培养信任的框架。他同时分析了公众参与网络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首先,在一个共同体中,此类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其次,公众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的流通,还体现了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最后,密集但彼此分离的垂直网络维持了每一个集团内部的合作,而公众参与网络则跨越了社会的分层,滋养了更广阔的合作。因此,普特南提出:“如果

① Ronald Stuart Burt,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Ronald Stuart Burt,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tal”,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 22, No. 22, 2000; Bonnie H Erickson, “Culture, Class, and Conne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2, No. 1, 1996.

② R. D. Putnam,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The American Prospect*, Vol. 13, No. 13, 1993; A. Bebbington and T. Perreault, “Social Capital, Development, and Access to Resources in Highland Ecuador”, *Economic Geography*, Vol. 75, No. 4, 1993; P. McClenaghan, “Social Capital: Explor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Education”,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Vol. 26, No. 5, 2000; P. Paxton,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An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2, No. 7, 2002; R. D.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K. A. Schafft and D. L. Brown, “Social Capital and Grassroots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Roma Self-Governance in Hungary”, *Social Problems*, Vol. 47, No. 2, 2000.